

# 鸵鸟式反腐让“房妹”大片高调上演

采桑子

郑州市委宣传部披露,日前被郑州市检察院立案查处的郑州“房妹”案主角翟振锋已被刑事拘留。(《新京报》1月7日)

“房妹”事件是近期最具戏剧性的公共事件。从微博爆料称“房妹”在郑州一个经济适用房小区拥有11套经适房房产,到“房妹”之父系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原局长翟振锋,再到翟家全家4口都是双户口、共拥有29套房产,且翟某已被刑事拘留。剧情可谓层层递进,高潮迭起,其间之波诡云谲,恐非寻常剧作家所能写就。

网友为“房妹”大片的剧情做了些总

结——第一季:爆料称90后女生在郑州有11套住房,疑为领导亲属;有关方面第一时间辟谣称房妹非领导亲戚。第二季:辟谣原是造谣,房妹为前房管局长之女。第三季:有关方面又一口咬定11套住房是商品房,而接着浮出水面的事实是,这些建筑所在小区是经适房小区。第四季:房妹的局长爹包不住了,不只全家有29套房产,还各有两套户口……当地有关部门的辟谣总是令人大跌眼镜,从其能隐则隐、能保则保的竭力护航中可窥见其“良苦用心”。

早在2011年9月,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原局长翟振锋就因“利用职务便利为亲属牟取利益及其他违纪行为”,被当地纪

检部门予以“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处分。党纪政纪处分的结果是,翟仍为二七区二七新城管委会工作人员,虽然没有职务,但如此贪腐无度,却仍保住了多少清白正直的有为青年梦寐以求也求不着的铁饭碗。更有甚者,翟振锋利用职务便利牟取的那些利益仍在:翟家至今仍拥有29套住房,每人两套户口就是明证。如今当地有关方面抵不住舆论的一再追问,翟可谓再次落马。这一次,郑州有关方面能否给党纪国法给公众的知情权一个满意的交待呢?

在此前对于翟振锋腐败案的处理中,当地有关方面涉嫌采取把头埋在沙子里从而顾头不顾尾的“鸵鸟战术”。群众对翟

某倒卖经适房的腐败行为进行反复举报,当地有关部门不得已而收治之;其间情节想必也是复杂的,比如翟肯定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最终收治的实质竟是帮其躲过了汹汹舆论的讨伐,甚至得到了某种变相保护。受这种“鸵鸟战术”反腐的羽翼之保护,翟某并非孤例。一些腐败分子被查处之后,“认定”的贪腐数额与真实数额存在较大差距,只查处公众举报的浮出水面的腐败行为(未举报的腐败行为听之任之),用拖延战术保饭碗,或者即便判刑了也早早给保出来任其逍遥,暗暗保留其财政供给等现象,在一些地方查办腐败案件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

如此这般,既是对党纪国法的不尊重,也是对民意的玩弄,对于腐败行为当然难以做效尤。有关方面用“保护式处理”的办法反腐,对某些深谙厚黑学的腐败分子不难难以产生警示作用,还容易带来不良的心理暗示甚至是示范效应。比如,此前查处过的翟某,就是因为有“鸵鸟战术”式的反腐袒护,他曾活得十分滋润。没有查处,贪官我自为之;即便查处了,29套房等财产有人替他保着,铁饭碗也有人替他留着。想想看,那些脸皮极厚、一心想发财且最具经济“理性”的贪官,是更愿意当一个两袖清风的清官,还是愿意像翟某那样大肆以权谋私?

冰点时评

## 民主从学会开会开始

邓聿文

说起开会,人们都不陌生。很多时候,只是为开会而开会,领导在台上一言堂,员工或属下在那儿假模认真听讲,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没有效率。所以,十八大过后,领导层倡导开短会,开有效率的会,可开不开的会不开。这是对目前冗长官会风的纠偏。

确实,要开好会,将会开得有生气、有效果,很不容易,尤其在涉及社会公益,或者与会人士众多、利益又对立的时候,更非易事。因为我们有着悠久的家长制传统,大家在会上都互不相让,不愿妥协。即使是自以为很有现代精神的人,也不大容易听取别人的意见或建议。

好的会议不但要有效率,达成结果,更要问这个结果是怎么达成的。人们开会的目的总是解决问题的。解决问题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暴力或强迫,一种是协商讨论。开会就是来协商讨论的,如果开会不是来协商,谁的势力大,就听谁的,这与强迫无异。而要协商,就得讲规则、讲程序、讲议程,先把这一套东西确立好,大家才能平等地坐下来谈——这样协商出来的结果就实现了程序正义,也即民主。所以,开会包含了民主因素,或者说,开会天生与民主有关,是一种民主训练。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曾在1917年拟定了一本“民权初步”,教人如何开会。他在自序中说:夫议事之学,西人童而习之,至中学程度,则已作为第二天性矣。然中国人受集会之厉弊,数百年于兹,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会之原则,集会之条理,集会之习惯,集会之经验,皆阙如。无有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以!所谓集会,则乌合而已!孙中山在此说是的,民主作为一种习惯,要靠一套规则去落实,而他这本著作,据说根据的就是在西方已经实行了很长时间的一套社会通行的会议操作程序——罗伯特议事规则写的。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曾在1917年拟定了一本“民权初步”,教人如何开会。他在自序中说:夫议事之学,西人童而习之,至中学程度,则已作为第二天性矣。然中国人受集会之厉弊,数百年于兹,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会之原则,集会之条理,集会之习惯,集会之经验,皆阙如。无有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以!所谓集会,则乌合而已!孙中山在此说是的,民主作为一种习惯,要靠一套规则去落实,而他这本著作,据说根据的就是在西方已经实行了很长时间的一套社会通行的会议操作程序——罗伯特议事规则写的。

好的会议不但要有效率,达成结果,更要问这个结果是怎么达成的。人们开会的目的总是解决问题的。解决问题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暴力或强迫,一种是协商讨论。开会就是来协商讨论的,如果开会不是来协商,谁的势力大,就听谁的,这与强迫无异。而要协商,就得讲规则、讲程序、讲议程,先把这一套东西确立好,大家才能平等地坐下来谈——这样协商出来的结果就实现了程序正义,也即民主。所以,开会包含了民主因素,或者说,开会天生与民主有关,是一种民主训练。

好的会议不但要有效率,达成结果,更要问这个结果是怎么达成的。人们开会的目的总是解决问题的。解决问题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暴力或强迫,一种是协商讨论。开会就是来协商讨论的,如果开会不是来协商,谁的势力大,就听谁的,这与强迫无异。而要协商,就得讲规则、讲程序、讲议程,先把这一套东西确立好,大家才能平等地坐下来谈——这样协商出来的结果就实现了程序正义,也即民主。所以,开会包含了民主因素,或者说,开会天生与民主有关,是一种民主训练。

好的会议不但要有效率,达成结果,更要问这个结果是怎么达成的。人们开会的目的总是解决问题的。解决问题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暴力或强迫,一种是协商讨论。开会就是来协商讨论的,如果开会不是来协商,谁的势力大,就听谁的,这与强迫无异。而要协商,就得讲规则、讲程序、讲议程,先把这一套东西确立好,大家才能平等地坐下来谈——这样协商出来的结果就实现了程序正义,也即民主。所以,开会包含了民主因素,或者说,开会天生与民主有关,是一种民主训练。



## 污染信息上报阻滞的根源在哪里

胡印斌

山西晋安天誉“1231”苯胺泄露事故指挥部7日上午召开第三次新闻通气会,山西省长治市长张保表示,去年12月31日事发后,企业上报的苯胺外泄量数量较小,认为这是一个一般的生产安全事故,所以没有及时上报省政府,这反映了对环保污染认识不够、警惕性不高,对苯胺进入浊漳河以后污染危害性估计不足。(中广网1月7日)

先是污染事发5天后才开始上报,后是坚称“污染不出界不上报”,这次终于承认“认识不够”、“估计不足”,山西有关方面的表态总算有了一点进步。这不仅不会损害长治市政府的形象,还会受到公众欢迎。毕竟,这样一次殃及三省、导致城市大面积停水的重大污染事故,仅仅靠抵赖是过不去的。

那么,无论是“瞒报”,还是“迟报”,抑或“不报”,撇开相关方面的口水争执,在污染事故上报乃至向社会公众公开披露的问题上,为何会频频出现信息遇阻的情形?

首先,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关联度太

高。出于经济利益考量,企业固不乏瞒报、迟报、低报的冲动,而政府出于鼓励产业发展等方面的考虑,也往往会在具体监管上倾向于企业一方。这从长治市的解释中即可明白看出,尽管企业自己上报苯胺外泄的数量较小,但负有公共安全职责的政府至少应该介入调查,而不是不加核实就听信企业报告。

在这一事件的善后处置上,地方政府可能存在“认识不够”、“估计不足”等问题,但也有政府被利益所诱的问题,过于计较短期政绩,忽略了真正应该高度重视的公共利益。近年来,长治市一直在强力推进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产业的转型,其中煤化工产业被赋予极为重大的责任。长治市政府网1月7日发布消息称,去年12月24日,潞城市天誉集团两大转型项目开工奠基,潞城市四套班子领导悉数出席,“项目全部投产达产后,可实现产值5亿元,利税3000多万元,将成为世界第二、全国最大的硝酸铵钙生产基地”。

其次,地方政府无视法律法规规定,置公共利益于不顾,特别是在涉及跨流域、跨区域污染问题上,往往存在侥幸心理。按照此前长治市新闻中心的说法,污染不出

## 早产

去年12月21日生产的部分三元核桃花生乳,其喷印信息显示的生产日期为2013年1月2日,“早产”最长的达13天。去年年初,部分三元特品鲜牛奶也曾被曝生产“早产奶”,生产日期提前两天。(中新网1月6日)

漫画:徐简

记者观察

## 让没有“户口”的候鸟自由地飞

张国(中国青年报记者)

自从连续报道了天津的毒杀国际濒危物种东方白鹳事件,我时常接到护鸟志愿者的电话。天津的摄影家王建民是其中尤为热心的一位。天津事件刚过,他立即赶到同年在渤海湾畔的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因为那里又发现了死亡的东方白鹳。没过多久,他又来电告知,河南的志愿者发现了非法贩卖珍稀鸟类大鸨的窝点,而甘肃也出现了类似的事情。

给我的感觉是,王建民这位摄影师、鸟类爱好者,简直成了“候鸟救火队员”。志愿者们与鸟类学者互通声气,在各地抢救救难的候鸟。偏偏如《中国青年报》报道所言,候鸟迁徙之路可谓“步步惊心”,各地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规而残杀贩卖候鸟的行为屡禁不绝。王建民屡次托我找到本报驻各地记者站,希望我和更多的新闻界同行关注此类事件。

然而,志愿者、鸟类学者和记者们即使遍布各地且都能被动员起来,就能形成有效的候鸟保护网络吗?从疲于奔命的王建民们可以看出,候鸟保护仍然处于“按倒葫芦起来瓢”的状态。不难感到,在杀戮面前,环保人士有种很深的无力感。

候鸟这些大自然的生灵是没有国籍的,更不会有户籍,它不属于哪个国家、哪个省份。沿着古老而漫长的迁徙线路,一只候鸟也许前些天在西伯利亚,不久之后来到渤海湾,再过几日又到达长江口。然而我们的保护往往以行政地域为界,地方官守土有责,只处理本地事务。即使在同一行政区划内,一片可供候鸟停歇的湿地,会有林业、水务、渔业、海洋、环保等多部门负责管理,而这些部门权限各异,最后谁也称不上负责,一旦出事,都力不从心。更不必说,致使候鸟步履维艰的祸首——

栖息地的破坏,有多少因素掺杂其中?候鸟没有户口,然而保护者却壁垒分明,不结束这种状况,一只候鸟在成千上万公里的迁徙路线上,跌跌撞撞、死里逃生得有多少回?它也许在天津获救,转眼就在河北落入“虎口”。其他野生动物亦是如此。这样还是“美丽中国”吗?

北京大学教授吕植在微博中指出,“美丽中国”的评价指标应该是:“自然保护区、濒危物种栖息地和关键生态功能区不因发展建设而退缩,受保护的物种种群保持稳定和增长,生态功能得到保持,自然资本纳入国家和地方的核算体系,并成为政府政绩的评价指标。环评应‘生态一票否决’。”

鸟类是对环境极为敏感的生物。这种生物的安危,不仅反映自然生态,也反映社会生态。我们应该尽快改变这种多头管理而管理缺失的状况。政府部门人力有限,无法面面俱到,这都可以理解。也正因此,政府部门更应打破内心里壁垒,主动与民间合作,发挥民间力量。“多一双眼睛就多一个监视器”,政府甚至可以考虑购买服务,让民间有意愿、有能力的人参与候鸟保护。

目前,由民间环保人士发起的全国护鸟网络公益项目“让候鸟飞”公益基金已经设立。但相信环保人士的种种努力仍只是杯水车薪。如果候鸟保护是一场战役,只能是“人民战争”,由广大的公众参与。我们的学校也应加强自然教育,培养对生命的尊重意识。

在天津的东方白鹳中毒事件近两个月之后,摄影家王建民仍会做恶梦。他梦见两只东方白鹳被粘在鸟网上,吓得从梦中醒来,又一次起身去清理鸟网。这绝不是一个人的恶梦。在我们所向往的“中国梦”里,不应有这样的恶梦存在。

## 请给孩子无条件的关爱

甘丽华

读完河南兰考孤儿收养所火灾的有关报道,忍不住流出了眼泪。这是一位在医院门口摆摊的妇女袁厉害“私人收养所”,七个被收养的孩子在大火中窒息而亡。破旧的棉被带着烧焦的痕迹,堆积在一起,更堵在人的心里。

“五孩(男,20岁);小雨(女,约5岁);扎根(男,4岁);傻妮(女,3岁);小哑巴(男,2岁);男婴(男,1岁);男婴(男,7个月)……”这是媒体列出的遇难者名单。除了“小雨”还略像个名字外,其他人则是真正的无名者,这些有残缺的生命像尘埃一样消散在人间。

和同事讨论起这则新闻,试图宽慰我的同事讲了两个小故事。一个同事回忆,小时候村里有个好吃懒做的妇女,据说把儿子送给附近驻军的一个营长了。消息传出,全村人都羡慕这孩子好命!人穷则情薄,骨肉之间也无非如此。

另一位同事则说起自己身边的“魔幻

现实”:几年前,离家20多年的前大姨夫,突然被东北某地的民政部门送回老家。此时,他已重病、瘫痪,不得不和90多岁的老母亲住在一起。春节期间,老母亲被其他兄弟接去过年,他一个人凄凉地走了,不知是病还是饿死。他曾求母亲给他买药,母亲抱怨说,我90多岁了,还要给你去买药?他重病时,也曾打电话让儿子去接他。儿子没有去,一句“过去20多年你在哪儿”就让他哑口无言。

这两个让人悲伤的故事,依然没有减轻我的愤怒感——为大火中丧生的兰考孤儿感到愤怒。人穷则情薄,这是人性的弱点。而这也,恰恰是诸如儿童福利院这样的公共组织存在的意义所在。社会救助机构的职责,就是弥补个体之不足和德之失。

说句也许不恰当的话,成人有选择的权利,就要为自己选择负责的勇气。而孩子,不具备选择权,他们既无法对抗大人的遗弃,也无法应对某些成人的精神暴力;他们不能选择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里,甚至无法选择健康地出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孩子是“零”,是“原”,需要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的无条件关爱。

对,“无条件”是我要说的关键词,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强调的是“条件”。从1986年起,袁厉害收养的弃婴已超过100个。其间,当地公安和民政部门都曾将弃婴送到袁厉害家。但是,袁厉害的收养条件并不好,孩子们的环境卫生很差,甚至吃不饱饭、看不起病,死亡率高达30%。在问及为何没有对这些孩子进行救助时,当地民政部门的意思是强制执行法权。

直到去年底,国家民政部才批准兰考建设儿童福利中心,此前,被遗弃孩子都得送到开封市儿童福利院。而开封市儿童福利院一度“因为条件限制”,不接受开封以外的弃婴。

这些看似天头上道的理由,其实要么消极无为,要么蛮横无理。民政费用是纯财政支出,政府预算应该充分考虑,才能保证包括社会福利救济在内的政府各项基本职能的实现。什么都可以讲条件,唯有生命不能讲条件;什么都可以等,唯有孩子不能等。

## 慈善机构不争气 仁爱者心寒

王学进

去年11月15日南都全媒体·奥一网联合广东省捐赠换书中心、广东省慈善总会·爱心点对点公益基金共同发起“幸福书单公益行动”,号召各界为西部山区孩子捐款捐书。然而到去年12月15日活动结束后,仅募捐到200多本书和100元捐款,远未达到7317元的募捐目标。有网友表示,不愿捐并非缺乏爱心,而是缺乏对募捐机构的信任。(《工人日报》1月7日)

这100元募捐款确实太寒酸了,但还有网友嫌捐多了,追问是捐赠了这100元。由对地方慈善总会的信任发展到对捐款者的恶意攻击,这表明我国官办慈善在公众心目中的公信力已降至冰点。

其实,这次活动的发起方除了广东省慈善总会,另外两方都是媒体,由媒体参与发起的慈善活动本不该遭遇这样的尴尬。而且,它有明确的捐赠方向和对象。应该

说,本次活动的效率和公信力有基本保障的。但事情可能恰恰在这里:活动方打出了广东省慈善总会的旗号——在郭美美事件导致红会公信力大幅下降的时期,谁还愿捐款给慈善总会呢?官办慈善落到如今这般悲惨境地,不能怪国人没善心,实在是因为慈善机构自己太不争气,太让国人失望、论责任,全在官办慈善机构自身。

就在上述新闻曝光的同时,《新京报》转发了1月6日晚央视《1+1新闻面对面》节目播出的有关儿慈会的后续消息:知名网络爆料人士周筱筱称,儿慈会13个专项基金自成立以来支出一直空白,其中一个名为“少儿健康专项基金”的项目没有任何直接用于受助人的款物,最大项目支出60万元是用于宣传推广。他通过对儿慈会2011年度部分银行流水账单及儿慈会官网捐款支出,发现了异常现金融动情况。笔者当晚看了这期节目,感觉可用一句话概括:一笔烂账的儿慈会至今尚无接受监督的诚

意,仍在敷衍爆料人和公众!

将两则新闻比照着读,笔者越发觉得“幸福书单公益行动”遭此败绩不是偶然。痛定思痛,官办慈善机构是到反思和谋求新路的时候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要变就要大变,单靠修修补补是无法重建公众对慈善的信任度的。鉴于目前官办慈善机构的一系列弊病,如官员兼任慈善机构领导、行政化色彩浓厚、官僚主义盛行,再加上舆论排挤、效率低下、自主性差、不透明、不规矩,甚至有可能存在的暗箱操作、权力寻租等腐败行为,有必要对慈善机构进行机构改革,与国外慈善事业的发展趋势相合,由政府行为过渡到社会行为,对部分由政府背景的慈善会和公募基金会等实施去行政化、去垄断化、去暗箱化,还原慈善事业的民间属性。同时,大力鼓励发展民间慈善事业,给社会组织松绑,降低社会团体申报门槛,放手让民间慈善力量自由成长和竞争。

## 考研如何改变命运

张田勘

201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于1月5日、6日、7日进行,全国有180万人报名考试。从2005年起,中国连续九年考研人数超过百万,在2013年达到新高。

莘莘学子考研和国家一年能为60万考生(接近近年3比1的录取比例)提供读研机会,这既证明了中国教育的蓬勃,也体现了国人接受高等教育人数的扩大。它不仅对于提高一个民族的素质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华民族未来的走向也至关重要。

无论高考还是研究生或博士生考试有多么大的不同,但有一点共性是显而易见的,即通过接受教育学到知识和技能,从而在毕业后改变个人甚至家庭的命运。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中,那些贫寒和草根之士通过受教育改变自身命运,不仅是现实可行的,也是目共睹的。

正因为教育能改变受教育者的命运,高等教育在中国的重要性也如同在其他国家的重要性一样得到认可。1998年在巴黎召开的首届世界高等教育会议通过了《21世纪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宣言》,提出了一个大部分人对高等教育认可的观念。高等教育的作用和质量应该体现为“价值增值”。

如果学生在进入高等学校之前和接受完高等教育之后的结果、成就、行为等可以测量的话,那这两者的变化越大,价值增值就越多,大学教育的质量也就越好,大学教育的作用就越大,就值得充分肯定。

然而,如果只是把受高等教育和考研考博的改变命运看成毕业后能找到一个好工作,那么当越来越多的能上大学和读研读博时,再持这种观念就可能相当失望甚至忿忿不平。如今,大学、硕士和博士毕业后,很多人已经不可能在找工作时获得鸟枪换炮的天壤变化了。

例如,在一些工作岗位的招聘上,

硕士、博士反而不如本科生、专科生。武汉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王丽娜(化名),在当地一家知名地产公司招聘会最终的面试环节,与江汉大学一位本科毕业生“狭路相逢”。本以为凭学历就可以轻松PK掉对手,却被用人单位以“学历太高”为由拒之门外。

其实,这并非房地产行业拒绝硕士、博士而宁要本科或专科生的现象,而是存在于多种行业。更有甚者,哈尔滨市环卫系统刚刚公开招聘的人员中就有7名硕士研究生,占所招聘录用人数的1.56%。如果从哈尔滨市环卫系统报名的现象来看,今后的研究生必然要与专科生、本科生竞争而且未必竞争得过后者的局面。

如果硕士和博士在接受高等教育后只能当环卫工,这样的命运改变就可能既不符合受教育者本人的期望,也与社会大众的期望背离。过去中国家庭教育孩子的一个普遍的说辞是,如果你不读书将来长大了只能去扫大街。但是,现在严酷的现实是,不少学子好不容易读完研究生就是为了能扫大街。尽管这种扫大街的动机是为了追求一个体制内的早涝保收的生存位置,但这与过去和一些国家相比,读了大学和研究能谋得一种体面的工作和职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面对这种变化很快的世界,上大学和读研改变命运就可能只是为了能获得一个好工作和好职位,而只能从另一种角度来解释受教育改变命运,这就是在认知、修养和世界观等方面提升自己。而这,才是一个人的终极改变命运,即改变自己的文化基因。有了较好的文化基因,即便毕业后不能获得鲤鱼跳龙门的机会,也会在将来某一天获得改变命运的机会。

如果从另一个意义看,改变命运的不只是读书,而是获得一个基本的学历和受教育机会,然后在实际工作中提升自己,从而在人生各阶段和各方面逐步改变自己的命运。